

“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也谈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米继军）

米继军

早就奉劝过首都师大政法学院哲学系的副教授陈明，李零是根本不值得一驳的，因为他已将自己的道德下降至“郑人或谓”的层面，下降至人民、百姓、群众、民众、众人。孟子尝有言曰：“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因而作为当代“郑人”的李零，是不可能窥见孔子是谁的——既不可能知道其圣人身份，也不可能知道何以其竟对人家称他为“丧家之狗”时竟表示说“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更直接地说，李零而知孔子，则孰不知孔子？

而陈明之所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耳！究其实，只是半斤对八两：在大肆批判李零的同时，为的是全面炒作自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陈明是不足以评判李零的。什么叫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以及愤青的心态？在为章太炎先生所首出的中国语言文字学中，先小学次文学而后诸子学，或曰先音韵次文字而后训诂；至于李零则是根本不懂什么叫训诂的，正如李学勤先生也只是假考古而真文献而已，声称“走出疑古时代”，结果却从未走出过；训诂之于李零正如考古之于李学勤只是他们的“学问口红”罢了。训诂学的核心在于词义、语义或义理。既如此，谁说李零是什么训诂家？而且训诂家的眼界又是怎样的呢？

至于作家的文采显然也谈不上，如果说王朔还算是一位作家，王小波也算的话，李零又如何能算？而且他们到底又有多少终极意义与道德担当？仅靠写几笔花里胡哨、哗众取宠的俏皮文字？别忘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矣”；同时也别忘了，正如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最后再说愤青的心态。看看陈明的些许文字，如何不见这样一种心态？因此此二者之间到底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最终又做了什么显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在章太炎先生看来，“中国学问之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而就当下中国学问而言，依本人之所见，其所失不仅当在于支离而且更在于汗漫——即因支离而汗漫，复汗漫而愈益支离。如庄子之所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如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遇焉以自为国。悲夫，百家必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下将为天下裂”——当下中国的学问其实早已不幸地为庄子所言中矣！

于是乎，孔子死了，这一次孔子可真的死了而且是被当下的诸子百家给支解进而是被溺死的，正如当年哲人尼采在其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公然宣布的“上帝死了”。如果孔子被神圣化，说明他并没有死，或者用其弟子子贡的话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果他被妖魔化，也说明他并没有死——或至少说他正活在批判他咒骂他的人的心中。然而当此之时，孔子却是真死了而且他就死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如汪洋大海般的意见（views）

而非知识里。尼采的上帝死了一句话其实是有着潜台词的，那就是：我该怎么活？但问题是，孔子死了，我或我们到底该怎么活？这并不是信仰而是哲学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可能并不严重，但严重的问题甚至是难以相见的严重问题很可能随之而来，接踵而至。正有如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而后的德国法西斯暴政的发生——据说法西斯的上台是十分民主的，是人民百姓或群众将他们推到台上的，而他们的初衷无他，即旨在反对当时日渐兴起的无文化、反文明甚至于非人类的法俄革命！因此法俄革命与法西斯暴政是一对矛盾、两个极端，此二者正相反对而且没一个是好东西，而它们又都是因由启蒙运动而起的。




李泽厚先生多年前提出的“告别革命”（它相对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或法俄革命基础上的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而言）无疑是好的，但正如李先生的学问并没有走得太远的原因在于它根本上是无根的因而也是无解的一样，“告别革命”的前提和根源就在于“告别启蒙”。既如此若此告别革命而不告别启蒙可乎？若人人都在像项羽初见秦始皇时在想彼可取而代之，人人都像陈涉似的不好好地去种他的地而是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则岂不是要革命、要天下大乱乎？还是去想想吧，何以孟子竟对所谓“汤武革命”百般辩护？何以老子要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及孔子何以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百姓何以会不知？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显诸仁，藏诸用”——因为百姓只能看到其中的“显诸于人（仁者，人也）”，根本看不到（而且更像是经典的作者有意不让他们看到）其中“藏诸（于）用”的部分，其中的“用”尤其是其中的“不用之用”、最大的用——正如无知之知是最大的知，无为之为是最大的为，无耻之耻是最大的耻一样）早已被经典的作者们盖了七重封印，极少有人能看到它！而这其中，似乎并不仅仅包括百姓而且真正的平民百姓是不会要求什么哲学的，而且更包括那些将自己的道德下降到百姓的知识分子。哲人尼采管“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叫做畜群并且极力主张必须将他们一扫而光。在他看来，“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意识到他们可以凭靠教育和美德超过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完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更完了”。其中前一句话并不难理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人人都像于丹或李零这样谈《论语》，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是要坏了？谁还会去像于丹那样讲什么影视专业（早知道自己竟可以靠一部《论语》一夜走红）？更进一步地说，谁还会去种地、生产？“满街都是圣人不仅不必要而且十分危险可怕！”至于后一句话的危险就在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笔者虽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据前辈讲，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语是强烈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王八蛋”——这无疑当年陈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绝佳的回响！于是乎，不劳而获的疯狂而有知的人们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不要指望当了教授、博导就一定是大学问，在孟子那里，天爵与人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极而言之，有的人搞了一辈子的学问，到头来不依然是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做学问需要有灵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在本人看来，当下的学者之中，其中极少有“生而知之者”，也少有如孔子自称的那样（只是他本人自称而他的弟子们却认为是天纵其智是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却多的是“困而学之者”，更多的是“困而不学”的民众！他们不是“学而不思则罔”就是“思而不学则殆”。包括本人在内的学人们，在衣食无忧、著书不为稻粱谋之余，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我到底要算是其中的那一部分人，真的应该按照孔子的分类标准对号入座。谁说于丹女士（本人从来不称其为什么教授）与李零先生（这个先生仅限于性别）不是孟子之所谓“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的“众人”呢？而于丹之所以会如此被众人推



崇亦可证明这一点；而那些假众人之口进一步明确推崇于丹的所谓我们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众人”！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发表日期：2007-5-15 浏览人次：309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